

整体性视域下的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探析

王曦晨^a, 张平^{a,b}

(华东理工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 b.法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从整体性视角探析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 悟透这一重要论述历史发展、内涵体系、实践方法的整体性, 有助于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发展, 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乡村。把握这一重要论述在理论基础、实践反思、文化基因和个人阅历方面的生成整体性, 领悟其在本体重释、价值形塑、实践指向三个层面的内涵整体性, 坚持以整体性视野、思维和原则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实践, 是阐释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整体性的基本图式。

关键词: 习近平; 乡村生态振兴; 生态文明; 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2)03-0001-09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Wang Xichen^a, Zhang Ping^{a,b}

(a. School of Marxism; b. School of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o analyze Xi Jinping's important observations on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integrit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notation system, and practical methods of these important expositions will b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s, and facilitate in building a beautiful countryside with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Grasping the holistic formation of this important discours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reflection, cultural gen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comprehending its holistic connotations in three levels: body interpretation, value shaping,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adhering to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with a holistic vision, thinking and principles are the basic schema to interpret Xi Jinping's holistic important observations on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grity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就乡村生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2018年3月, 系列重要论述凝练为“乡村生态振兴”新提法。从生态文明建设、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生态振兴在乡村振兴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1]。目前学界对“乡村生态振兴”的研究大多聚焦其现实难题与对策分析, 刘志博分析了乡村生态振兴面

临的制约因素, 提出了“制度-设施-行为-文化”的四维对策建议^[2]; 沈辉提出了“三维”路径机制^[3]。另有学者选取特定视角展开研究, 包括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观念-主体-治理”振兴理路^[4]、生态安全视角下的五重路径^[5]等。总的来看, 现有成果多采取“问题-路径”分析框架, 罕有从整体性视角透视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的研究。为此, 笔者拟从整体性视角审视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 把握其在理论生成、内涵体系和实践方法三个层面的整体性, 以期为深刻理解与践行这一重要论述提供理论参考。

收稿日期: 2022-0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0FKSA003)

作者简介: 王曦晨(1993—), 女, 辽宁辽阳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三农”问题。

一、认识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的整体性特质

2018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生态振兴支撑点”^{[6][15]}。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乡村生态振兴的战略定位、目标使命及实践要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回答了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乡村生态振兴,如何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问题。2020年6月,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以生态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以生态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彰显了乡村生态振兴的整体性特征。2022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出台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指导意见”,在顶层设计层面进一步凸显了乡村生态振兴的整体性特质。以整体性视角审视这一重要论述,才能将其理论整体性贯彻到乡村生态振兴实践中。

1. 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具有历时性特征的发展着的理论。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或者说,为了产生科学的因素,最初的知识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7]。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将乡村生态问题置于宏大历史叙事中加以考察,审视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一的历史进程,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与当前农情相结合,形成的乡村生态振兴整体性方案。具言之,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当前中国乡村场域生态问题本质的科学认识与解答,这一答案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浮现的,体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进展原则”是一种理论获得生命力的内在脉搏。习近平正是锚定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在乡村的叠加表现——乡村生态困境,着眼于剖解乡村生态矛盾的本质规律,进而生成了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

这一理论将始终随着乡村振兴实践不断拓深,始终面向乡村生态前沿问题发挥指引作用。

2. 内涵体系的整体性

作为真理的理念应当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全体,包含很多的阶段和环节在它自身内”^[8],这种真理的“有机结构原则”是通过“矛盾发展原则”的推动发展而达到完满的本质。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虽然散见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类场合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但通过梳理分析与归纳,可以发现这一重要论述回应了新时代乡村生态问题对整体性指导理论的诉求,表征为其内涵体系的整体性。一是回答了本体论的问题,对乡村生态的属性、要素构成及其地位做出了合目的性、规律性的界定,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城乡关系现状的宏观背景出发,定位乡村生态对国家和社会的战略意义,廓清乡村生态振兴涉及的各项要素、环节及其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关系。二是回答了价值论的问题,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具有多样化的技术路线,其背后蕴藏着根本价值立场,统摄乡村生态振兴的方法论体系,构成了重要论述价值论的部分。三是回答了实践论的问题,即回答了从哪些环节实现自身理论中设置的价值准则问题^[9]。概言之,重要论述以本体论界定的乡村生态振兴范畴为基础,以价值论匡定的根本立场为统摄,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将辩证法、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等统一到解决中国乡村生态困境这一主线上来,从不同环节回答了乡村如何实现生态振兴,构成了具有整体性特质的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内涵体系。

3. 实践方法的整体性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是理论本身的归宿,研究“问题”的整体性内涵是为了保障这种整体性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得到发挥。从对“问题”的整体性认识上升为“解决问题的活动”需要一套方法论系统。“方法论”具有三类定义,即实践学意义上的一种“提出巧妙程序的方法的科学”、逻辑意义上的“使用心智的方法的研究”与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作为历史产物和过程的研究”^[10],这种实践学与逻辑意义相结合的方法论,并非研究关于“如何提出巧妙方法”的科学,也并非探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而是一套关于完成特定实践

活动的一般方法原则。迄今为止,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历经了直觉、思辨的逻辑方法,观察分析、归纳演绎的形而上学方法,普遍联系与发展的辩证方法等。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以唯物辩证法总特征和基本规律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凝练的有效工作方法,整合人民群众在基层实践中创造的经验方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把系统观念应用于求解现实世界问题的原则,从整体出发思考“解决乡村生态困境的实践”应当如何推进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关于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一般性方法论,具有实践方法的整体性。

二、溯源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生成的整体性

阐述一种思想理论生成的整体性,需着重考察其在理论基础、实践反思、本土基因和个人阅历等方面的缘起。

1. 理论基础的整体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观照乡村

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观照乡村生态问题。马克思关于“自然生产力”的思想阐明了人类得以创造历史的前提条件即生产维持“肉体的主体”生存的物质生活本身需要借助自然界和自然力生产,而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必定从农业劳动出发,土地作为有肥力的自然基质率先提供剩余产品,表现为“自然的赐予和自然的生产力”^[11],随后才有电、金属、煤炭、磁等自然力的大规模驯服。马克思批判了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将土地完全商品化,“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12]919},造成地力枯竭和环境污染,他认为“合理农业”应寻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均衡,保护“土地这个人类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12]918}。马克思从剖析生产力的源头入手,开启了生产方式的生态转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奠定了根基。中国共产党人赓续马克思生态思想路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乡村山林水田是相辅相成的,要求整体考虑农村环境的用养结合,指出“为了保障田地生产,不受水旱灾之摧残,最便利而有

力的方法,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还能保护道路、有益卫生……又可增加群众之利益”^[1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用两百年绿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的重要论断,开创了“三三制”耕作制设想,即在 18 亿亩耕地的 1/3 植树造林,实行大地园林化。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因地制宜搞发展的辩证观点,指出农村“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14],要求各地农村根据实际搞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产业。如,黄土高原的农村要鼓励绿化,“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15],黄山周边农村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资本就是山”^[16],开创了农村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新思路。江泽民强调农业是基础,提出“农业要高产、优质、高效、低耗”^[17]的要求,注重科技创新对现代农业生产、保护环境的重要推动和保障作用。胡锦涛重申“人类生产活动首先是从农业开始”这一基本原理,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按照高产、优质、生态、安全的要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两型”农业生产体系,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强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18]。因此,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是对先前理论成果的传承和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观照乡村的最新理论成果。

2. 实践反思的整体性:坚持从整体性视角审视乡村生态问题

习近平以彰往察来的历史眼光和高瞻远瞩的全局视角审视中国乡村生态问题,从环境史视角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中总结教训,从现代化建设历史成就与生态环境代价中反思深层原因,立体研判中国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境况。习近平指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惨痛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不能再在我们手上重犯!”^{[19]13-14}。纵观人类发展史,大多是在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社会中度过的,人们结成聚落迁徙生活,与自然生态系统融为一体。公元前一万八千年至公元前六千年,“农业”耕作陆续在两河流域、中国、拉丁美洲、安第斯山脉区域出现并传播,人类才逐步采取定居垦耕的方式生存,与自然生态系统碰撞融合。随着人口稳定增长,人类开始开拓更大范围的栖息地,砍伐

森林、灌溉土地的活动创造过辉煌文明,也因生态根基的破坏造成了苏美尔、玛雅等文明的衰败。相较于农业文明,工业革命推动的技术进步展示了其创造城市这一最彻底的人工环境和人口增长的超能力,表征为工业、城市对农业的奴役和对农村的吞噬。习近平反思现代化建设“多年快速发展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指出当前“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6]107}。中国现代化进程并没有逃脱先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规律:发展动力上高投入高消耗、空间格局上先城镇后乡村、发展模式上先工商后农业、对待生态环境上先污染后治理。这些特征聚集在短短30年的中国经济腾飞期,引发了现代化“后遗症”,突出表现为乡村生态问题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叠加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短板。由此,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是在整体反思古今中外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生成的,是解决当前中国乡村生态问题的根本指南。

3. 本土基因的整体性:自觉与中华民族优秀生态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20]4}。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典范成果,是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具体农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用典,从中华民族先民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哲理思想中汲取有益资源,主要包括从《易经》《道德经》《资治通鉴》等经典著作中获取道法自然、顺天应时、取之有度的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古老智慧;从《管子》《庄子》和古诗文中体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地人相统一的理念;从《朱子家训》、唐诗宋词中汲取勤俭节约的高尚品德。此外,习近平还关注到中国古代管理农事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指出“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20]4},并从《周礼》《田律》《伐崇令》等礼制律令中获取启发。《田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律令。作为官方出台的环保律令,“《田律》二”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麋(卵)毇,毋

毒鱼鳖,置罔(网),到七月而纵之”^[21],表征了当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保护林草水苗,以确保生态平衡、农业延续发展的先进治国思路。汉承秦制,西汉《淮南子》规定:“畋不掩群,不取麋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22]。秦汉两代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严格的农业环境保护制度,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领先的农业大国。习近平不忘本来,怀揣深厚的文化自信,自觉从中华民族优秀生态文化中挖掘对当前乡村生态问题有益的思想理念,在此基础上融通生成的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本土印记。

4. 个人阅历的整体性:习近平执政的生态情结和“三农”情怀

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再到掌舵大国,习近平始终将自己视为黄土地的儿子,怀揣与生俱来的“三农”情怀为农民办实事,在带领农民建设农村的过程中生发出生态思想,并在执政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了作为整体性理论体系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萌发于陕北梁家河,成熟于“乡村生态振兴”的系列论述,彰显了其个人阅历的整体性。1969—1975年,习近平在陕北梁家河的大山里插队,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使习近平第一次体会到生态环境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他带领村民办沼气,建成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23],亲身体会到循环利用资源的益处,通过带领群众种植烤烟挖掘出蕴藏在大地里的经济价值,通过河桥治理、打水坠坝体会生态治理、农田基建对农村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初步萌生了生态情结。1982年,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开启从政生涯,他解放思想、敢为人先,大刀阔斧提新战略,在带领群众“振兴正定”的艰苦实践中加深了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解,既意识到农业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农业发展有一个生态战略问题,又发现蕴藏在山川草木中的发展大势,形成了发展立体化现代大农业、建设科学化生活的现代农村的战略思想^[24]。1985—2002年,习近平任职福建,在厦门、宁德、福州等地严抓狠抓环保的实践中,开始以系统工程视角审视生态建设,认为生态建设不仅是污染治理问题,更关系到产业良性发展,在全国率先提出“生态省”建设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论断。如,水土流失就是财富的

流失,水土保持就是财富的保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2002年,习近平调任浙江,在认清浙江环境污染问题已不是局部问题后,提出要“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转变”^{[25][223]},向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迈进。2005年8月,习近平在安吉天荒坪镇余村首次提出,“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25][153]}，“两山论”蕴含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的转化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论,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思想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继续发扬其生态情结和“三农”情怀,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丰富并完善其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以生态文明思想观照乡村,形成了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答了如何处理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彰显了其个人阅历与治国理政的一脉相承。

三、把握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内涵的整体性

习近平从本体论、价值论与实践论三个层面回应了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理论关切,彰显出其理论内涵的整体性特质。

1. 本体重释:以乡村命运共同体作为乡村振兴的本体内核

对乡村发展问题的探讨最终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本体之争。习近平指出,乡村振兴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6],超越了一元中心论的桎梏,谋求重塑乡村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认为振兴乡村要保留乡村原有风貌,让乡村良好生态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一是以命运共同体视野系统观照乡村山水林田湖草沙。习近平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9][47]},形象地阐明了自然生态系统间进行物质循环的全过程。事实上,西方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将生态环境作为系统加以研究,中国先民则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易传·彖传上》有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27],先民用“乾坤”概念表示人类活动所依赖的天地自然变化形成万物的规律,用“五行”概念表达自然万

物之间的联系以及生态演替的规律。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就是要系统修复乡村山水林田湖草沙复合生态系统,恢复乡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二是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处理乡村振兴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8],辩证地扬弃了西方“深绿”思想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强调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人类成员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中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应当自觉肩负起维持命运共同体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29]。传统乡土中国是典型的以血缘、地缘为结合纽带的共同体,始终保持自身稳态,基本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结合状态。但是,在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乡土中国的共同体发生瓦解,外界力量裹挟资本将自然资源待价而沽,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土地撂荒和过度开发同时出现,引发了乡村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危机。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塑乡村命运共同体,实现了消解乡村人与自然矛盾的本体重释。

2. 价值形塑:以“为农民而兴”的价值目的统摄生态振兴

振兴乡村的方法论体系具有二重性,社会性的逻辑旨归统摄自然性的“技术路线”。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6][115]},彰显出乡村生态振兴“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的。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殷切追求就是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肩负这一历史使命,致力于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让农民安居乐业要摧毁“三座大山”,“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有田种,有饭吃;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安居乐业目标与农业合作化道路一致,服务于国家工业体系建设;改革开放后,农民安居乐业获得了新内涵,小农重新与土地结合,农村多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30]的要求推进。当前,让农民安居乐业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党的十

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8]的总要求全面推进。习近平秉承“农民要什么,我们干什么”的原则,及时回应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新期待,提出“建设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6]115-116},习近平谋划乡村生态振兴宏伟蓝图,将农民反映强烈的人居环境问题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强调要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让农村环境美起来,新业态旺起来,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农村自然会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3. 实践指向: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落地见效的路径选择

在重释乡村命运共同体为本体内核,明确“为农民而兴”的价值归宿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

(1) 空间布局:分类优化乡村空间。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乡村形态快速演变的阶段。习近平指出,乡村振兴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6]119}。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基层建制单位的合并是一个普遍趋势。顺应人口布局变动,根据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发展等复合因素统筹城乡空间布局,分类优化乡村空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要让现有的300多万个农村居民点全部实现乡村振兴^[31],而是要将乡村振兴放在城乡一体化历史进程中统筹考虑,还要将城乡一体化进程放在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约束下加以考虑,以主体功能定位为指导优化城乡空间布局,这既符合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理念,又符合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长期趋势。一是在国土空间规划层面确定中心生活圈,围绕城市群和县城调整村庄布局。以“三区三线”为基准,科学划定市县层面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严守三条红线。在此基础上,围绕大中小城市和县城确定城镇生活圈,强化城镇对乡村的带动能力,根据村庄集聚规律确定城镇和村庄的布局与规模,形成城乡交相辉映的空间形态。二是根据不同村庄特点分类开展空间布局调整。对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系统脆弱的乡村,梯次推进异地集聚搬迁,实施还绿工程或复垦;对于城中村应逐步通过改造将其与城市融为一体,城市近郊村具备成

为城市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应紧跟城市需求拓展短途休闲、农事体验、农业科技园等产业模式;对于具有特色资源的村庄,应着重保护其整体形态和文化传统,加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服务型职业农民,发展特色服务业。此外,中国一般乡村占比达70%,其中,自然淘汰的空心村和分散村应逐步撤并重组;布局相对集中的连片村庄或中心村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宜推动有序集聚,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建成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2) 动力机制: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振兴乡村的驱动机制是一个历史范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6]111-112}。绿色发展是一种谋求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共生共荣的发展模式,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其变革涵盖农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一是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产业系统是联结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重要纽带^[32],长期粗放单一的产业运转模式致使乡村生态退化、资源约束趋紧、面源污染加重。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选择,通过绿色技术革新降低乡村产业发展的环境外部性,推动产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良性交互,同时挖潜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变革方向。二是以“原生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原生态”既是一种物质载体又是一种活态文化,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是对“原生态”文化基因的发掘、发展与保护,深入发掘原生环境中的活态文化基因,将人、生态、文化视为完整的系统加以保护和利用,才能将乡村文化留在原生地,为文化振兴注入活力。三是以绿色导向政策吸引人才,引导各方力量参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农民是主体。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大力培养适应乡村新业态的本土人才,吸引城市人才下乡,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气。四是以农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引领环境治理走向现代化,推动乡村社区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绿色发展需要一套成熟的环境治理体系作为保障,以设施建设为基础,探索建立覆盖乡村“最后一公里”的环境治理机制,逐步形成乡村生态环境网格化治理与监管模式,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网格化监

督,促进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

(3) 锚点定位:以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为主要着力点。习近平指出,“农村生态环境好了,土地上就会长出金元宝,生态就会变成摇钱树”^{[6]112},推进乡村生态振兴,主要着力点在于切实改善乡村生态环境,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农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生存空间。一是把保护和修复农村生态系统作为重要环节。城市和农村是陆地重要的人工生态系统。2017年,中国农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占国土面积的 95.93%^[33],维持和提供了自然生态系统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修复农村“大生态”是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障。二是以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为重要举措。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当前,中国农业源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和总磷(TP)排放量分别占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 49.8%、46.5%、67.2%^[34],占据了“半壁江山”,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防治工作任重道远。习近平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35],形成覆盖前端污染源监测预防、全生产流程绿色化发展、污染存量治理、污染防治延伸绩效考核的推进格局,建立并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政策制度、技术体系和运行机制,减轻土壤和水环境污染负荷,促进土壤和水环境质量改善。三是将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作为重点任务。习近平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6]117}。城乡发展不平衡最直观的表现在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差距,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是影响农民生活品质的突出民生问题。受农村居民点分布、技术瓶颈和国家发展重心等因素影响,东中西部农村整治效果差距较大,一些地区刮风整治现象盛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与居民点集聚趋势和县域乡村规划协同考虑,按城乡空间布局总体部署分批差异化推进。对于具有人口聚集趋势的中心村和近郊村,应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置体系,一体化实施农村改厕与污水管网铺设,鼓励专业化、市场化建设和运营模式,形成农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对于将长期存在的分散村庄,应扶持农户改建沼气池等污水处理设施,在垃圾收储运处理基础上加强无害化、规范化处

理,逐步淘汰简单填埋和焚烧处理方式,普及不同水平的厕所改造;对于拟撤并调整的空心村则不宜投入过多资源实施整治,应尽快根据空间规划实施易地搬迁。

四、践行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方法的整体性

习近平不仅提出了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指向,更强调整体性的实践方法,以推进理论的整体性转化为整体性的实践。

1. 用整体性视野将生态振兴融入乡村全面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局

乡村振兴不能就乡村论乡村,生态振兴不能就生态谈生态。习近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要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让绿色发展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一方面,生态振兴作为乡村“五大振兴”中的关键一环,具有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地位。“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文明兴衰存亡、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加以审视,强调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乡村是生态系统的重要涵养地和载体,推进乡村生态振兴,保护好乡村“大生态”环境,才能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保存物质基础,为中华文明赓续传承保有活态遗产。要以整体性视野统筹乡村全面振兴,将生态振兴贯穿于产业、人才、文化、组织振兴中,一体设计,整体推进。另一方面,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场域,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成效关系到美丽中国建设质效。习近平在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成美丽中国”^{[20]14},庄严宣示了生态文明建设面向“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乡村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又蕴含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巨大潜力。“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要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将美丽乡村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美丽中国的底色。因此,必须避免割裂乡村生态振兴与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避免分割生态振兴与产业、人才、文化、组织振兴之间的联系,以整体性视野将生态振兴融入乡村全面振兴和生态文明

建设全局。

2. 用整体性思维统筹乡村生态振兴顶层设计

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生态振兴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农村环境整治、农民素质全面提升,客观上涉及农业主体功能区划与空间布局、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产地环境保护与生态系统修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提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众多要素和环节,构成一个要素互相联结、互相影响的复杂巨系统,具有复杂整体性特征。从复杂系统角度来看,乡村至少包含自然子系统和人类社会子系统两个部分,自然子系统以生物化学反应与物理形态为主线,构成乡村自然物质基础;社会子系统以人口为能动因素,通过经济系统与自然子系统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循环^[36]。一旦乡村复杂巨系统内部某环节达到或突破生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临界点,系统的自组织运行将遭遇巨大挑战。用复杂系统审视乡村生态振兴,要建立有效的系统协调机制,使乡村发挥自身生态优势,通过物质、信息等要素交换形成与外界环境相互依存的绿色发展方式,同时推动乡村经济、人口、自然资源、环境等子系统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总利益最大化的良性循环格局。为此,要用整体性思维统筹乡村生态振兴顶层设计,对其包含的各环节和维度进行科学分类,筛选“吸引子”和关键要素,分别形成乡村生态振兴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交互和管控机制使它们与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形成约束与促进关系,推动各个子系统达到各自目标^[37],最终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整体目标。

3. 用整体性原则掌握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时空节奏

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既不能脱离实际、急功近利,又不能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习近平强调,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准确聚焦阶段任务,科学把握梯次力度,明确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时空节奏。一是遵循“适度”原则,确保乡村生态振兴的顶层设计、实践推进与所在场域客观实际的“度”相适合。具体来看,东部发达地区乡村、大中城市郊区等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起点

较高,具备建设高质量美丽乡村的物质基础,在统筹谋划乡村生态振兴时可依据实际提出较高目标,建设乡村生态振兴示范区、引领区,在全国率先探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态转型的路径模式;中西部、东北等欠发达地区乡村建设基础条件较之东部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统筹规划乡村生态振兴要避免“揠苗助长”,搞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标准可以适当低一点,谋划符合地区发展阶段的实践方案。二是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与方法论,具体乡村具体方案,避免一个模子套到底。矛盾的特殊性包含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矛盾普遍性又贯穿于矛盾特殊性中,共性统摄个性,决定了解决矛盾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必须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如,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增值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共性环节之一,但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差异决定了推动自然资本增值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发展生态体验农业、建设美丽乡村、保护与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等都是发展生产力,推动自然资本增值的实现形式。

习近平关于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是面向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时代航标,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发展,探析这一重要论述在历史发展、内涵体系、实践方法三个层面的整体性特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谱系的再推进,有助于丰富并发展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对于推进新征程上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俊飏,王学婷.乡村生态振兴实现路径的对策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2):152.
- [2] 刘志博,严耕,李飞,等.乡村生态振兴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J].环境保护,2018,46(24):48-50.
- [3] 沈辉.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难题与破解路径研究[J].生态经济,2021,37(9):196-200.
- [4] 杨美勤.“生命共同体”引导下的乡村生态振兴理路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6):183-190.
- [5] 赵金科,李娜.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与践行路径——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思考[J].长白学刊,2020(5):117-124.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麟,王玖兴,译.北

- 京：商务印书馆，2017：19-20.
- [8]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M]. 贺麟,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34.
- [9] 王延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整体性研究——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重要讲话的学习与理解[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7): 45.
- [10] 切克兰德. 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M]. 左晓斯, 史然,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201.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2.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中央档案馆. 《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1[M]. 江西: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271-272.
- [14]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16.
- [1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868.
- [1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535, 536.
- [17]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33.
- [1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 人民日报, 2008-10-13(01).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20]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 求是, 2019(3): 4-19.
- [2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27.
- [22] 刘安著, 陈广忠, 校点. 淮南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26.
- [23] 《梁家河》编写组. 梁家河[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 100.
- [24] 习近平. 知之深爱之切[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138-144.
- [25]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26]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403.
- [27] 姬昌. 周易全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334-335.
- [2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 [29] 余泽娜. 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三层关系[J]. 云南社会科学, 2021(1): 30.
- [3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05-10-19(01).
- [31] 陈明. 乡村振兴中的城乡空间重组与治理重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4): 9.
- [32] 翟坤周. 生态文明融入现代农业产业: 耦合机理与技术路径[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7(4): 87.
- [33] 焦思颖. 2017 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发布[J]. 资源导刊, 2018(6): 36.
- [34] 本刊编辑部. 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J]. 环境保护, 2021, 49(7): 4.
- [35] 习近平.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J]. 求是, 2022(7):13.
- [36] 文宗川, 崔鑫. 基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生态城市建设[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0(1): 85-88.
- [37] 唐怀坤, 刘德平. 智慧城市复杂巨系统分析[J]. 中国信息化, 2020(9): 47-49.

责任编辑: 曾凡盛